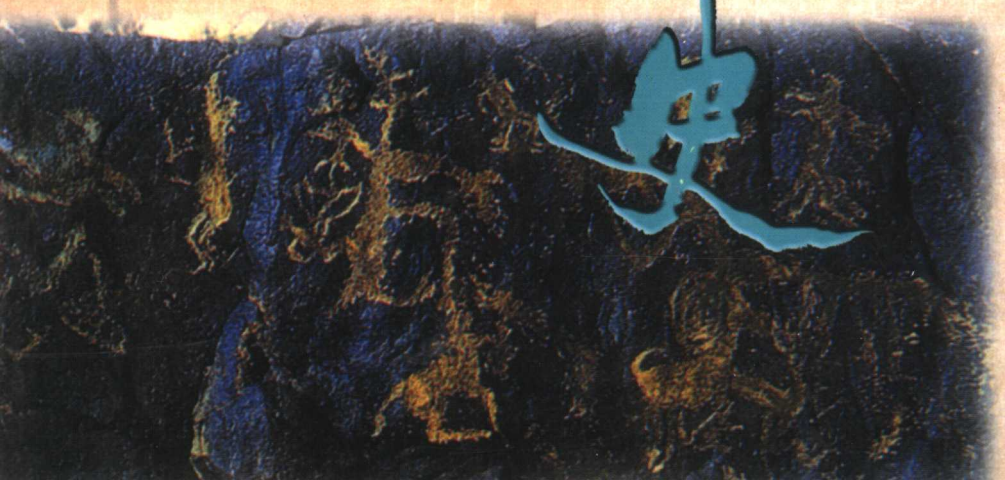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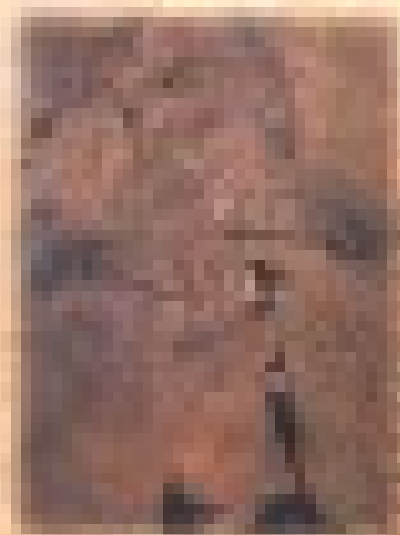
如大史文与群... 李德嘉百著

中国语言文化史

王工... 史... 史... 史...



中國革命軍人



书 名 中国语言文化史
作 者 李葆嘉 著
责任编辑 周 方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 - 5521756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
插 页 4
字 数 471 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180 册
书 号 ISBN 7 - 5343 - 5366 - 1/G · 5061
定 价 36.00 元
邮购电话 025 - 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 - 3249327, 3249091
盗版举报 025 - 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自序

一

根据人类学家的见解——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和现代文化。这一“现代”，不是指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或 20 世纪的“现代”，而是指人类进化史上的“现代”，即从距今约 12 万年前现代人类出现之际开始的“现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感受性和语言性，所谓人所认识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所谓人类的“认知世界观”首先表现为语言的世界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行为、文化形态、交际工具和符号系统。语言的成熟促使人类实现了从自然界动物向社会性动物的彻底转变，从体质上的现代人类最终进化成心智上的现代人类。迄今为止，在现代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发生过五次重大的信息技术革命：距今 4~3.5 万年前的现代语言的成熟，距今 6000 年前的苏美尔文字的产生，10 世纪到 15 世纪的印刷术的发明，19 世纪的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出现，20 世纪的网络技术的革命。其中现代语言的成熟和文字的产生尤为关键：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具备了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文字的产生成为人类社会从蒙昧时期跨入了文明时期的显著标志。

在人类文明史上，语言文字学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核心位置，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人类文明结晶表现为文献。虽然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不可以没有语言；然而一个文明社会，却不可以没有文字。既然人类历史的划界以文字的出现作为“史前”和“史后”的准绳，那么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就是文字的诞生。同样，只有以

文字为载体记录下来的知识才可能形成学术或进一步发展为学科,否则就是原始崇拜、原始巫术和神话传说。历史提醒我们:对语言自发分析形成的原初语言文字学是人类最早的原初学科,它比号称“学科之母”的古希腊哲学要早几千年。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腓尼基字母的引进。字母中所包含的“音素论”模式则直接成为古希腊“原子论”哲学的蓝本,由此创造了许多学者大惑不解的“人类历史上的希腊奇迹”,这一奇迹进一步成为西方科学的滥觞。〔1〕

在古代社会,语言文字学的地位显赫,许慎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在现当代社会,语言文字学仍然是一门显学,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作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底座的语言学,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其研究方法同样也渗透诸多学科。可以与生物进化论相媲美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是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骄傲。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众所周知。50年代的“乔姆斯基革命”,推动了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至于语言美学狂飙突进百年,语言哲学在西方成为主流哲学,更是世界学术史上不争的事实。

二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的研究等一度成为热潮。文化语言学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德国洪堡特(W. von Humboldt)的人文语言学思想和欧美人类语言学的观点。虽然从文化的立场写过一些,主要是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论著,但我不

〔1〕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属于任何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而拙文也未涌进所谓“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通过多年来的思考,我所赞同的语言观是“认知符号系统观”,所主张的语言史观是“语言主体历史观”。

所谓“认知符号系统观”,主要含义如下:

1. 人类文化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语言是基于心理机制认知对象世界且建构文化意识形态的耗散性符号系统。

2. 依据语言符号的音义二分观,语义性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形态语法范畴是原始认知语义类别,形态变化标志是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影。西方语形语法学仅是虚象语法学,语义语法学才是实相语法学。〔1〕

3. 语音并非简单地表现为语义的物质外壳,语音是人类认知的工具和结果。抽象的、封闭的音位系统存在于生动的、开放的词音系统中。

4. 语音的感知模式取决于语言的结构模式,语主对语音结构的自然感知通过文字符号的结构方式反映出来。〔2〕

5. 东西方的语音分析模式与思维模式、哲学模式同构,派生文化的结构模式是这些基本模式在子文化领域的分别延伸。〔3〕

所谓“语言主体历史观”,其主要含义是:

1. 语言的主体是社群或语主。语种的起源与该语主的文化起源和民族起源是三位一体的问题。

2. 语主存在于社会之中。语言的存在和发展表现为语主、空间和时间的三维性。语言的空间存在表现为语主的地域迁徙,语

〔1〕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与语义语法学理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言的时间存在表现为语主的历代传承。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及其机制不在语言系统内部,而在语言系统外部,即语主的发展变化导致语言的发展变化。

3. 一种语言在历史上的巨大变迁,本质上是语主的历史嬗变。一个民族放弃本族母语而使用另外一个民族语言的现象,对于换用者而言是语言的换用,对于目标语而言则是语主的变化。

4. 一部中国语言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诸语言的接触互动史;一部华夏汉语发展史就是一部华夏汉民族日益壮大与周边民族融入汉族的语言同化异化互动史;一部汉语方言史就是中原民族大迁徙与周边民族汉语化的融合互动史。因此,汉语方言分布就是汉民族不断迁徙和周边民族持续汉化的历史投影。

5. 语言具有双重性,语言既是一种本体文化形态,又是其他文化的通用载体,因此可以称之为“语言文化”;语言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称之为“语言文化史”。

确立认知符号系统观和语言主体历史观的目标,就是为了尝试建立中国语言文化史。

三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动态概念。据研究,“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成王在位时期。^{〔1〕}中原居民古称“夏”。《说文》:“𠄎,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引申之义,大也。从、从页、从臼。从臼,两手;从夂,两足也。”根据字形,“夏”是一个上面有头、中间两手、下面两足的人形。通过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一种民族的原始自称与该语言中对“人”的原始种称通常具有一致性或同源性。“夏”的引申义“大”,其字形就是简化了的人形,因此“夏”兼有族之自称和人之种

〔1〕 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称的双重性。

周人来自西方,其祖母为姜原。《说文》:“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根据字形和字音,“姜”、“羌”同源。《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周人是迁徙到渭水流域得而兴旺发达的一支羌人,早期的经济方式以游牧活动为主。《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既自称是黄帝族之后裔,故承袭了“姬”姓,又追溯其祖先为虞夏之臣,故自命“有夏”、“区夏”,其同宗诸族称“诸夏”,其语言则谓“雅(夏)言”。

中原居民又古称“华”,后世将“华”与“夏”合为“华夏”。“华夏”一词不见于殷墟文献,甲骨文中没有“华”字,在金文中才开始出现了不少“华”字。“华夏”一词,是周人本其“尚文(彩)”之风尚,在沿用已久的“夏”字前冠“华”而成的。〔1〕《尚书》中“夏”字出现计43次,指周人之本族仅4次,其余多指夏王及其有夏一代,可见周人具有“对夏代之自我肯定”意识。〔2〕《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从语源方面追溯,“华”、“夏”音近同源;从语义方面推敲,“尚文”并非“华”之本义,“华”为“花”之本字,取花卉生生不息之形象以喻氏族兴旺发达之意象,因此合“华夏”而为自称。

春秋战国时期,华、夷、戎、狄、蛮等大规模地融合。战国以后,秦、楚、吴、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庸等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中原河洛与周边“诸戎”、“四夷”相区别,而形成以“诸夏”、“中国”为名号的主体民族认同感。〔3〕《礼记·王制》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

〔1〕 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大陆杂志》31卷第1期。

〔2〕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151页注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李亚农《西周和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同,言语不达。”不同语言之间的交往,要通过古代的译官如“象胥”或“司言”等,《周官·秋官·大行人》:“象胥谕言语,协辞命;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战国末期,《荀子·荣辱》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反映了当时已经形成长江流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越、楚(先后以洞庭湖流域和江淮流域为中心)和黄河流域(以河洛流域为中心)的夏,这三大语言文化区域的明确概念。

随着周代封建联邦制的式微,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走上了集权专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同时国家的名称成为主体民族的名称。据研究,西方称中国为 Thin、Cina、Sinae,皆源于“秦”的对音或传播流变,英语中演变成 China。汉译佛经中,唐时已将梵文称中国的 Cina 译为“支那”。〔1〕而中原民族自称为“汉”则始于汉朝,匈奴单于遗汉代皇帝书有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王士元(Wang, Willan S-Y)教授提出:根据 Van Slyke 的看法,“两千二百年前,汉水把它的名字给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存在的朝代(1988: 22)”,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假设,但还需要证实。〔2〕

今粗略查考: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上源玉带河出今陕西南部的宁强县,东流到勉县与褒河汇合后称为汉水。汉水古代又称沔水,因此汉口亦名沔口。古代汉水又有西汉(水)、东汉(水)之别。东汉水亦名沔水,即今汉江,西汉水即今嘉陵江,皆源于汉中地区。战国时期楚怀王设置汉中郡,因在汉水中游而得名。公元前 207 年,刘邦被封为汉王,即居汉中巴蜀,灭项羽后遂以“汉”为国号。因

〔1〕唐玄宗《题梵书》:“毫(当作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见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

〔2〕王士元《语言的变异及语言的关系》注⑥,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文化学院出版社,1995年。

此,中原居民称“汉”源于刘邦所建之“汉”,“汉”之名源于刘邦封号“汉王”,“汉王”之名源于封地巴蜀之“汉中”,“汉中”之名源于当地河流之“汉水”。

虽然“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成王在位时期,然黄河中游平原一带自称为“中”却始见于殷商甲骨文的“商中”。《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来自东南沿海的商民族以鸟为图腾或崇拜象征。商民族自称“商”,整个字形为“祭祖”的会意。简而言之,“商”就是“祖”,“大邑商”就是祭祖或祖先之城。^{〔1〕}如同周代的京师镐京称“宗周”,即周族的祖宗之城相仿。象征王权和神权的“商”,成为殷商氏族的名称和居住都邑的名称。“商中”,即处于国土中央的大邑商。胡厚宜说:“商而称商中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之起源也。”^{〔2〕}刘熙《释名》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与“商中”结构相仿的名称是“原中”,即后世之“中原”。《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杨慎解:“野间谓之中原。”此“中原”泛指原野,与作为黄河流域区域专称的“中原”含义不同。《荀子·王制》:“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月暴露,毁折之中原。”《商君书》:“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其“中原”已指攻取天下的关键区域——河南平原,而陕西渭水流域一带则称之为“关中”。与“中原”义近的是“中州”、“中国”。“中州”始见于司马相如《大人赋》:“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颜师古注:“中州,中国也。”

“中国”其本义为中央帝王所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郑玄笺:“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中国”后引申为指中原地区或诸夏领域,如《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民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中国”再进一步泛指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境之内,

〔1〕 张光直《商名试释》(1995),《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

〔2〕 胡厚宜《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中华书局,1970年。

《汉书·陆贾传》：“(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此“中国”已经与“天下”相当。虽然“中国”一词逐步成为以中原为中心所统治的国土疆域的统称，但在历史上习用的还多是指代黄河流域的“北中国”，相当于广义的“中原”。与“中国”相当的名称还有“中土”等。

“中原”、“中州”、“中国”本来义近，但在词义演变过程中各不相同。“中州”专指河南一带，“中原”则从河南地域的狭义扩大到黄河流域的广义。诸葛亮《出师表》：“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三国时期的“中原”与江东、西蜀相对，作为区域名称的“中原”已扩大到陕西一带，乃至黄河流域的北中国。南北朝以来，中原(北中国)与江南(南中国)的划分通常以淮河流域为界。靖康之难以后，“中原”进一步成为南奔居民所眷念故土的文化象征。这从《宋诗纪事》的诗歌可略见一斑，葛天民《尝北梨》：“甘酸尚带中原味，肠断春前不见花。”路德章《盱眙旅舍》：“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1〕至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是“不胜狐死首丘之情”。南宋以降，“中原”一词，已从地理区域名称演变成为文化传统概念。

“中国”一词，在历史上虽然已经逐步由帝王中央所都扩大到中原地区、北中国王朝以致整个邦土，但是以之为国名却是在20世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所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之，“中国”则成为现代通行国称。因此“中国”一词具有古义与今义、狭义与广义之别，古义与狭义指华夏汉民族长期栖息的“古代中国”邦土，今义和广义指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现代中国”国家。同样，“中国(狭义)语”可涵盖“古今汉语”，“中国(广义)语”也可作为“中国境内语言”的总称，但是不可以单指中国境内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中国语言学”可以专指“汉语语言学”(个别语

〔1〕 龙晦《释〈中原雅音〉》，《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

言学),也可以泛指“中国境内的语言学”(一般语言学)。

王力先生早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1935),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起初取名可能是模仿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后来改名大概是为了“名副其实”。然而《中国音韵学》之“中国(语)”作为古义与狭义解释,就是指历史上的“汉(语)”,比如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指的是以《切韵》为代表的隋唐古音。虽然将旧版书名“中国(语)”改成新版“汉语”,似乎避免了以偏概全之嫌,但是仍然免不了历史上的名称纠葛。因为周秦时期的中国不称为“汉”,当时的中原诸夏语言也就不可能名之“汉语”,而上古音所研究的对象是周代的“雅言”。如果刻意强调准确,那么岂不是应当定名为《雅言·汉语音韵学》?换言之,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著作即使冠为“汉语”,仍然摆脱不了概念的模糊性。归根结底,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是一个外延和内涵不断演变的、动态性的政治、地理、文化和语言的概念。作为文化符号,我们必须认同“中国”这一概念的过程性或模糊性,否则“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中国”是指华夏汉人所居住的、以中原地区为故乡而在历史上不断向周边迁徙扩展的动态区域;另一方面,“中国语言”是指三代华夏人和秦汉以降的汉人所前传后承、以商周文献为最古老,而在历史上不断与周边语言接触互动、交融发展的动态语言。

“语言文化”可以有两种理解,“语言的文化”或“语言与文化”。作为“语言的文化”,是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研究;作为“语言与文化”,是把语言与其他相关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本书的“语言文化”具有双重性含义,是因为作为文化形态的语言与其他相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所谓“本体”的文化与“载体”的文化互为表里。根据以上对“中国”的解析,本书采取的“中国语言文化史”这一术语自然兼具不同的相关含义,至少有如下三种:

1. 作为汉语的祖先,华夏语(夏商周中原语言,周代称“雅言”)

的发生及其与中国(广义/今义)境内其他语言之祖先的亲疏关系。

2. 汉语(秦汉以后的汉人母语,虽然有“通语”、“北语”、“晋语”、“吴音”、“秦音”、“正音”、“雅音”、“官话”、“国语”、“普通话”等不同名称,但是可以通称“汉语”)的发展演变与中国(广义/今义)境内的其他语言在相应历史时期的互动关系。

3. 华夏汉语的演变发展与其他相关文化或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上的“华夏语”、“汉语”、“华夏汉语”都可以称之为“中国语”;作为总称,“中国境内的其他语言”也可以称“中国语”。从语言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出发,脱离中国境内的其他语言的现存和历史状态,就无从深入研究中国(狭义)语言文化史。进而言之,脱离周边国家语言的现存和历史状态,也同样难以从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上研究中国(广义)语言文化史。

四

经过不断的探索,对历时和跨域的宏观语言学研究逐步形成了新的思路。

1. 根据生态环境和文明类型导致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从空间分布发现时间流变和连续统理论的综合性思路,试图提出“语言关系类型的连续统假说”和“语言结构类型的连续统假说”。谱系树模式是依据闪含—印欧语言材料提出的理论框架,而世界语言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四种:以渔猎—采集文化为基础的连锁型语网;在一些地区,语网的断裂则形成离散型语珠;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同化型语区;以游牧文明为基础的分化型语系。以往的语言关系研究仅以“语系”为惟一的上位概念,除了勉强归纳为几大语系,对许多语言难以归纳成系或谓之系属不明,不可能从生态环境和经济类型等方面阐释世界语言关系的多样性。究其原因,传统历史语言学语系说的基本出发点是语言的相似性,而采取的是简单比对·归纳法,不

仅无从抽象世界语言关系的不同类型,而且历史比较法中的一些原则,比如语音对应规则的限度和信度,因为急于建立语言亲缘关系,也没有展开详尽的论证。

2. 不同的语言类型导致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的自发产生。西方语言的形态结构导致了西方传统语法的形成,即以形态语法范畴作为划分词类和结构成分的依据。中国语言的孤立结构孕育了中国传统语法的形成,即以实词和虚字作为音义训诂和句义理解的依据。美国语言学家在调查印第安语言的过程中,发觉欧洲传统语法无法直接套用,才促成层次分析法的发明。换言之,屈折语自发产生形态分析法,孤立语自发产生语义分析法,编插语则催生层次分析法。如果粘着语自发产生分析法,应当是词根—词缀分析法。这一研究思路,是将我在10年前所提出的“语言类型对文字类型的制约性”,扩展为“语言结构类型与自发研究方法的制约性”,将相关制约性原理从语音学领域延伸到语法学领域。

3. 揭示自在的语法研究方法,并非否定语言研究方法具有相通性。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必然互相影响和交融,把汉语的事实嵌进欧洲语法研究的传统框架,同时承袭了传统汉语虚字学研究成果的《马氏文通》,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整体框架上的削足适履对汉语语法以及中国语言学研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语言的个性是一个存在,语言的共性也是一个事实。语言之间具有语义通约性,语言研究之间具有方法沟通性。在众多语种或不同语言类型的基础上,可以产生更具普遍性的研究原则与方法,这就是普通语言学的任务。从洪堡特开始甚至更早,欧洲的一些学者就试图冲出屈折结构的狭隘视界和欧洲语法学的传统框架。然而不幸的是,在现代欧美语言学研究日益朝着普通语言学方向发展的学术潮流中,一些中国学者在撇开外来“印欧语眼光”的同时却陷入了狭隘的“汉语眼光”。

4. 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不应一味强调汉语表面特征

而作茧自缚,这背离了“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原理。中国语言学家的重大任务应当是运用中国境内或东亚—南洋的广泛语料,发现不同于依据印欧语料所得出的语言原理,以丰富世界理论语言学宝库。王士元教授的“词(字)汇扩散理论”对历史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学生桥本万太郎(M. J. Hashimoto)的“语言地理推移论”是东亚语言学的重大理论建树。虽然存在以一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个别语言学,但并非世界上几千种语言都需要或有可能建立几千种各自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建立当代普通语言学的关键在于——只有首先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类型学理论和语言关系类型学理论,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普通语言学原理。建立普通语言学的逻辑程序至少应当是:个别语言的语体语言学——个别语言学——类型语言学——人类普通语言学。没有经历这样的程序所建立的普通语言学,比如欧洲“普遍唯理语法”,所谓“普遍”仅是屈折语的普遍,所谓“唯理”则是西欧人的理性,不可能具有人类语言学的普适性。

5. 现代汉语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普通话,以至于在回答了“什么是现代汉语”(套用普通话定义)以后,面对“讲家乡方言的父母说的是什么语言”的提问而瞠目结舌。语言的研究似乎可以沿着如下线索逐步扩展:汉语方言(包括普通话)——古代汉语——民族语言(中国境内)——周边语言——世界上其他语言。1997年,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学科被合并为“汉语言文字学”,据说“意在打通古今”。如何打通?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尤其是对语言年代比较古老的南方方言的研究,也许是贯通古今汉语的一个突破口。同样,古代汉语的研究还必须导入相关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否则视野狭窄而难以深入。至于进一步的贯通,就是与藏缅、阿尔泰、南岛—南亚毗邻三大语言的历史性贯通,对华夏汉语史进行溯源沿流的探索。由此,我提出“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汉语史研究理论模式和“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

6. 由于西方科学文化难以抗拒的物质化优势,文化的世界性合流不可避免。从15世纪开始,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扩张,欧洲科学主义文明和基督教精神开始冲出欧洲,向全世界洪溢,近现代东西方文化的合流徐徐拉开序幕。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的语言学传统趋向于逐步合流。在公元前,由于地域相连且以字母的流传为线索,闪含语言学传统和西欧语言学传统早已逐步合流。18世纪和19世纪之际,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印欧语系的建立和谱系树模式的创立为标志,实现了印度语言学传统和西欧语言学传统的合流。由于印度雅利安语言和欧洲语言的同源性,印欧语言学的合流比较成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氏文通》的出版成为东西方语言学试图合流的最初尝试。但是由于东亚语言与西方语言的结构类型和关系类型的差别,印欧—东亚语言学的合流则步履维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撞击、尝试和修补,汉语言文字学传统方法和西方语言理论至今仍未能融会贯通。除了从西方照搬的自然科学,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在20世纪的演变多与之类似——西方框架与中国事实的错位。

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在中国走向国际的宏观背景之下,反思“现代语言学”和重建汉语语言学成为热点。以80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的异军突起和三个平面理论的创立为标志,到90年代终于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三个平面理论、句法语义理论、配价语法学、功能语法学、格语法、字本位理论、认知语法学和计算语言学等百花齐放的格局,实现了理论和方法从一统到多样的历史性转折。通过对百年探索的深刻反思,应当认识到——东西方语言学长久难以合流的原因在于基点选择的偏误。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义属性,语言的结构本体是语义结构,作为语义结构投影的语形变化受控于语义结构。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基点,不应是在西方语言具有、而汉语却没有的形态变化以及在形态归纳基础上

自发建构的西方语形语法学,而应是以中国传统语法学为渊源、在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语义结构的基础上而重新建构的语义语法学。尽管语义结构的研究有如“泥潭”,但是随着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有待于语义网络研究的突破,21世纪定是语义语言学的世纪。这一对西方语形语法学的严峻挑战,昭示着东西方语言学在语义结构基点上的合流最终不可避免。

五

面对当代“多维立体语言学”全面超越结构主义的状况,语言和言语、内部和外部、静态与动态、描写和阐释、形式和实体之间的人为疆域正在冰消瓦解。任何一种语言学流派,都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学术潮流息息相通;任何一种语言学方法,都有其哲学理论基础或方法借鉴来源。结构主义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就是法国社会心理学,此外还吸收了瑞士经济学派的观点。

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交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实,任何有价值的本体性研究都离不开交叉性观照。对语言性质认定的不同,将导致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四大主要走向。第一,认定语言性质是交际工具,以语言功能为基点的语言教学研究。随着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的“世界化进程”,语言的世界化进程也同样不可避免,作为大国形象的标志,对外语言教学将日益扩大。语言教学需要建构“语言·文化·心理”的系统模式。第二,认定语言性质是结构系统,以语义结构为基点的工程语言学研究。将人脑语言机制通过数字化程序移植进电脑,智能机的研制成为新世纪的重大工程。以电脑模式“仿生”人脑模式,语形的形式化研究必然转向语义的形式化研究,进行可计算语义网络的研究成为语言信息工程的当务之急。第三,认定语言性质是文化形态,以语言的人文社会价值和演变机制为基点的人文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勃发触动了一系列边缘语言学的诞生和复兴,在相关领域进行交叉性研究充满勃勃